



創作小叢刊

草 藏 文

宋雲彬

848  
690

創作出版社發行

創作小叢刊第一輯  
孫陵主編

(2)

破  
戒  
草

宋雲彬

## 序

過去在上海做書店編輯，有時候也替報紙副刊寫點所謂「雜感文」。夫文章而稱之爲「雜感」，不免帶有幾分牢騷或憤慨，容易得罪人。於是有些朋友好意勸我：還是有系統地看點書，不要再寫這類文章。同時自己也覺得寫的文章太淺露，沒有什麼意思，就立誓不再寫所謂「雜感文」。

抗戰以來，各方面都團結起來了，文壇上也很少論爭，這現象自然是好的。可是我結習未忘，偶爾得到某人變節或某公消極等消息，總是憤恨與感慨交併，想寫些短文來發洩一下；有時看到一些倒退與落後的現象，更是痛心切齒，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因此，前年秋間，有幾位朋友在漢口辦刊物，拉我寫稿，我便又破了戒，開始寫所謂「雜感文」了。不能寫長篇大論，只能寫些雜感，也是爲才力所限，無可奈何。來桂林後，時受艾清兄的鼓勵，又寫

了好多篇。現在重新選擇一下，得十四篇，都凡二萬言，印成這小冊子。昔仁和龔自珍嘗戒爲詩，後乃復作，自題爲「破戒草」，現在就竊取來作爲這小冊子的名稱。

本來想自己斥資付印，已承張友慈兄設計封面，何鼎新兄代鑄鉛版，現在交給「創作出版社」印行，封面也就由他們去設計，特此向張何兩兄道歉。

二十九年五月，雲影識于桂林

825  
690

# 目錄

序

從學鮮卑高講起.....

章太炎與魯迅.....

淪落了的健士.....

古今中外的漢奸典型.....

雜談兩則.....

(一) 雜談

(二) 美和醜

從生死問題談到人生態度.....

雜談三則.....

(一) 雜談

一〇七

一三八五

(二) 藝文

(三) 海關

讀讀書

懷新文化運動三戰士

「日本人是餘福的子孫」辨妄

從「華文文字」說開去

元祐黨人碑

觀桂戲「桃花扇」有感

想到寫出

(一) 詩學

(二) 詩與語言

(三) 朗誦與氣吟

(四) 詩美

(五) 詩題

## 從學鮮卑語講起

當四世紀初到六世紀末的二百八十年間，中國長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騷擾，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漸漸減退了。司馬遷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只說他「會欲得當以報漢」，而六朝人偽造的李陵答蘇武書，竟說什麼「陵固負德，漢亦寡恩」，可見那時候一般文人只懂得個人恩怨，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至顧氏家訓所記，當時士大夫竟有教子弟學鮮卑語，彈琵琶，以備服事「胡貴」的那種醜態，更不堪設想了。

然而當時那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究竟比我們落後，所以實際上漢人學鮮卑語的還是少數，倒是鮮卑人都在那兒學漢語，被胡服。因此十多年前，梁啟超曾告誡日本說，你們不要妄想征服中國，即使現在中國被你們征服了，過了五十年一百年，你們日本人統統被中國人同化，日本的國家就完了，不相信，請一查我們的歷史！到現在，還有人拿這來作「中國不亡」



的歷史論據云。

如果歷史的發展是循環的，這種論據倒也未可厚非；只可惜現代的日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帝國主義的國家，不是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國時代的「胡人」，也不是三百年前的「倭寇」，而我們却已由文物之邦的「上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了。所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怕被我們同化，它還準備做「更生中國文化」的偉業哩。

早幾時，在「文摘」上見過一篇什麼「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記錄」的譯文，出席人中頗有幾位是一向赫赫有名的「京派」教授，而知堂老人之出席，尤為一般人所注意。知堂老人在座談會裏表示，爲了研究日本應該學日文，但學日文而不到日本去是毫無用處，所以他說，「於這裏，只好大概地教授關於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這問題，漸漸便會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當然，知堂老人勸人學日本文，是「爲了研究日本」（現在應該說爲了研究敵情），和北齊時候的士大夫教子弟學鮮卑語者大有逕庭。所可惜的，知堂老人這一番話不在討論怎樣研究敵情之類的座談會裏發表，而却被記錄在「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記錄裏，這使

我們感到知堂老人的勸人學日本文頗有勸人學鮮卑語的傳統意味，只是沒有教人家學習日本樂器，較顏氏家訓所記者略勝一籌而已。而且知堂老人人口聲聲勸人家到日本去，希望人家「會漸漸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雖然他沒有說明應該馬上就去，還是中日戰爭停止了以後，但在「皇軍」大肆淫殺之後，而希望人家「漸漸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這種心理，比教子弟學彈琵琶，更難了解——也許我不懂得弗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之故（知堂老人曾說過，如不懂弗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批評他的思想態度，都是徒勞）。

「九一八」以來，平津長在日本軍勢力的威脅之下，難道知堂老人之流因受了這種長期的威脅，竟也把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都減退了嗎？我想不會的。只要看對日抗戰以來，一般士大夫對於國家，民族的關懷就可知道：他們有的拋掉了商龜周鼎，從日本跑回來（注意，從日本跑回來，不是到日本去），幹救亡工作；有的離開了堯典禹貢，從北平跑到陝甘邊地去做宣傳工作；更有投了筆桿上前線去的。因為現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畢竟和過去異族的侵擾不同，這不必什麼歷史專家，稍具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所以當這國家民族臨到最後關頭，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只有加強，決不會減退；儼知堂老人那樣含垢忍辱，甘心而

敵人委蛇周旋的，究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即就所謂「舉」「德」而論，知堂老人身任國立大學教授，國家對他不算「寡恩」，他也何至於「負德」。大概知堂老人捨不得離開他的第二故鄉北平，同時又不能——也許不甘——做什麼地下工作，就只好跟敵人敷衍一下。假使司馬遷復生，也許下這樣的評語——「會欲得當以教漢耳」。

## 章太炎與魯迅

民國十七年夏間，章太炎病沒於蘇州。那時候魯迅臥病上海大陸新村，有人去望他病，談到章太炎的死，他慨歎地說，「我想不會有很多人能够瞭解太炎先生的吧？」後來，他病漸漸好了，就寫一篇題爲「談章太炎兩三事」的短文，而這篇短文竟成了他的絕筆。他在那篇短文裏指出章太炎的倔強的個性和過去倡導民族革命的功績，而痛斥那些淺薄無聊惡意攻訐章太炎的爲「蜉蝣撼樹」。同時他指出章太炎晚年曾替軍閥捧場，認爲「只是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魯迅是章太炎的門弟子；在章氏門弟子中，怕沒有第二人能寫得出這樣一篇褒貶得當的文章。

其實魯迅說章太炎過去替軍閥捧場爲白圭之玷，也是春秋責備賢者的話。略小節而論大體，章太炎自有其一貫的民族主義，始終沒有動搖過（當然也沒有什麼進步）。他在三十年

前主張聯合中國境內各民族以推翻滿清帝國，兩年前主張聯合各黨各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這是一貫的；他雖不懂得「聯合戰線」的口號，但他在前年北平學生運動最緊張的時候，曾有電報給宋哲元，說「學生諸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日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懷。」「但問今日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這就是說，「只要現在主張抗日就行，何必追求他一向屬於何黨何派。」到現在，我們所要求的，還是要大家「坦懷」相見，在抗日的一個目標之下加緊團結，不要生新事，算舊帳。所以我曾說過，章太炎這一個短短的電報，將和他的宏文巨著同垂不朽，而惜乎章氏的門弟子不能了解這電報意義的重大，沒有收入新刊的「太炎文錄三編」。

章太炎和魯迅，雖然為學的方向不同，而性格意氣頗相近。太炎早年曾運用他的如椽大筆，掃蕩那些叛黨賣友的智識分子，誅伐那些「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的保皇黨徒。魯迅自執筆著「新青年」寫文章，即以鬥爭的姿態出現，一直到臨死前幾小時還沒有丟掉他的「投槍」。章太炎晚年的文章漸趨平淡，魯迅則桂薑之性，老而愈辣，似乎更勝一籌了。即以文章技術而論，能够學到章太炎那樣犀利勁悍，辭無

枝葉，而用辭精確，善於刻劃，起止自在的，怕也只有魯迅，雖然有文言與白話之別。

章太炎逝世剛滿兩週年，魯迅逝世兩週年紀念又快到了。太炎先生還沒有正式舉行「國葬」，據說他的家屬因倉皇避寇，把他的遺骸暫埋在蘇州家園中。魯迅先生是經成千成萬的羣衆舉行公葬了的，可是「萬國公墓」已經在淪陷區域中了！我們在今天懷念這兩位民族革命的戰士，比去年要更增一層感慨吧？

## 沒落了の策士

中國在封建割據時代，有所謂「策士」者應運而生，最著名的是戰國時倡合縱連橫的蘇秦和張儀。蘇秦張儀都沒有一貫的主張或確信的主義，只憑三寸舌以游說諸侯，博得自身位高金多。然而他們的言辭確乎動聽。當他們到某一侯國去游說時，把政治，軍事以至地理環境，經濟狀況，國際形勢，說得頭頭是道，無論合縱也好，連橫也好，都不容你不墮其術中——這便是所謂「縱橫術」。衣鉢相傳，一直到辛亥革命後，在新的軍閥割據局面下，策士又活躍起來，不過名稱變了，叫做「政客」。民國以來好多次軍閥內戰，都有政客從中播弄。

國民革命的北伐，結束了軍閥割據之局，策士也就跟着沒落。雖有些小政客還在鄉裏偷竿地活動，但掀不起大波浪，至多只能騙到一筆旅費或津貼，要借此以名顯鄉里，誇耀宗族。

，是不可能了。尤其在這全國團結上下一致的抗戰期中，縱橫術更無可施用。

然而策士們雖然沒落，卻沒有絕跡；他們所長在「權變」，也不至於對權技窮。當抗戰未發動前，他們發揮「唯武器論」，主張暫時對日屈服，等準備充分了再抗戰。抗戰發動了，而且已支持了一年多，他們便來歌頌抗戰。然而說不定換了一個局勢時，他們又搖身一變，變為主和論的倡導者了。他們也常常談國際問題，但他們不承認現在國際間有侵略與和平兩大陣線，因為這是事實，而策士們必先否認事實，纔能逞其雄辯。所以當抗戰初發動時，他們絕口不談中國應與英法蘇等民主國家聯合，而偏談什麼「德意路線」。等到全國上下都已瞭然於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敵人的幫凶時，他們又來一套迷離恍惚，陰陽怪氣的理論，例如說懷德有聯合之可能，張伯倫的「現實外交」早定之於十年以前等，總之，無非故意抹殺事實，以逞雄辯，亂視聽而已。他們一談到內政，更會上下古今，縱橫馳騁，而字裏行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這些都是蘇張縱橫術的真傳衣鉢。中國的殘餘封建勢力一天不剷除，遑遑了策士就一天不會絕跡。

太史公痛惡蘇秦，所以對於主張合六國以拒秦的蘇秦有惡辭，然而他不能不憤嘆增說：

「此兩人（指蘇張）真傾危之士哉！」在這中華民族爭生存的重要關頭，在這戰局嚴重的時候，那些「傾危之士」，倒應該注意而提防的。

一九三八，九。

## 古今中外的漢奸典型

我有一位朋友，他藏有「秦會之詩文集」，視同珍寶，不肯輕易示人。他常常對人說：「秦會之的詩文實在不錯，單看他的詩文，決計想不到他是一個出賣民族的漢奸。」秦會之詩文集不見於藏書家的目錄，我那朋友所藏的一定是出於好事者的偽託。然而秦會之詩文，無我想像，一定是不壞的。當他做御史的時候，彈章諫書，傳誦一時，尤其是反對劉地給金國，反對劉裕做傀儡皇帝，正義凜然，不愧為一位風骨稜稜的諫官。假使他當時短命死了，我想他的詩文集一定和「臨川全集」「南豐類稿」之類同傳後世的。

因此，使我覺到漢奸並不是天生成的。儘有許多年少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所謂革命志士，一旦發跡，便改變他的志操，只要有高官可做，有大財可發，奴顏婢膝，什麼卑鄙醜惡的事都會做出來。而且那些人大都是小有才，詩文做的不壞，說話也很動人。因此，他們決心做漢奸的時候，便會創造出一些「漢奸理論」來，同時用種種方法去表託或污

萬赤心爲國的忠臣義士。例如秦會之，他既決心從惠來高宗跟金國講和，便先大發其所謂「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謬論，一方面又誣罵當時散布河北一帶的義勇軍爲流寇，又對主戰將領大肆攻訐，說他們都是割據一方的跋扈武臣。秦會之死了幾百年，他的鬼魂似乎還不會寂滅，每當強敵壓境，我們的抗戰稍受挫折之時，這個鬼魂兒便會嫋嫋來遲，呼之欲出。

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有這一類「漢奸」，蘇聯的託洛斯基便是一個好榜樣，當託洛斯基參加十月革命時，他的豐功偉績，誰也表示欽敬的，然而曾幾何時，他變節了，變成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了。當他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時候，竟不惜跟法西斯強盜聯合一起，情願把祖國烏克蘭奉讓給德國，只要能够推翻建立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執政者史太林。但你如果單看他的漂亮文字，也決計想不到他是一個出賣祖國的「漢奸」。

這樣看來，所謂「漢奸」，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大都是一個典型。就是：小有才，能够寫漂亮的文章，講漂亮的話，借此來投機取巧。所以我們今後對於任何人都要像孔子說的「聽其言而觀其行」纔成！

一九三八，一二。

（按這篇脫稿時，汪精衛還沒有離開重慶。——作者。）

## 雜談兩則

### 一 雅與俗

最近在第七十五期的「宇宙風」上讀到了「武者小路實篤懷周作人文」和周作人寄武者小路實篤書」，是周作人自己翻譯出來的，又加上一個題目，叫做「友情的通信」，後面還加上一段按語。武者小路的文章，除表示友情的關懷外，還想「聽聽周作人對於誰也不會表白過的真心話」。而周作人的回答是：「現今中日兩民族正在戰鬥中。既然別無道路，至於取最後的手段，如再講什麼別的話，非但無用，亦實太鄙陋耳。東山談苑卷七云，「倪元璽爲張士信（誠？）所辱，恥口不言。或問之，元璽曰，一說便俗。」此一則我向來很歡喜，斯德奈爾部所也」。

「雅即鄙陋」，按通常說，不俗即高雅。不過何謂「俗」，何謂「雅」，也很難說。元璽

如現在有許多青年在那裏寫抗戰論文或通俗詩歌，這在周作人看來，也許以爲「太鄙陋矣」；但青年們一看到周作人在這時代還躲在苦雨齋裏寫那些幽閒自在的小品文，不但覺得他鄙陋，怕還要引起厭惡哩。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曾批評一位詩人道：「雅得這樣俗」，我不知道現在的青年們對於這位自命高雅的周作人先生給他以怎樣的批評。

周作人之歡喜東山談苑所載的那一則故事，似乎不僅在「一說便俗」這句話，而含以倪元璽自況的意思。只可惜倪元璽的時代和周作人的時代不同，倪元璽受張士誠的侮辱，也和周作人蜷居北平甘心與敵人委蛇的不同。倪元璽瞧不起張士誠，情願黃冠野服，混跡編氓，大概爲張士誠出身鹽販，不懂得禮賢下士之故，這還可以說是保持士大夫身分。周作人不肯離去被敵人佔領了的北平，又不肯「混跡編氓」，做一些應當做的秘密工作，無論他怎樣「兢兢自守」，（周老姊寫給周健人先生信裏的話），在客觀上怕逃不了「漢奸」這個惡諡吧？即就「雅」和「俗」方面講，怕倪元璽之所「俗」，正是周作人之所謂「雅」，將來「苦雨齋集」未必能和「清悶閣集」並美吧？

周作人把日本軍部法西的狂暴侵略和我們的神聖的民族抗戰，曲解爲「中日兩民族的戰

門」，這是何等不可容忍的罪過……據我看來，周作人所應該怕的，不是「一開口便俗」，而是「一開口便錯」。

## 二 美和醜

武者小路實篤在「懷周作人文」裡講到了愛國心。他說「愛國心既是自然的，我也承認。實際有些支那的青年人同我在一起到村（按，指他所創立的新村）去的時候，談話的話可以愉快的談，辦到日支戰爭，那支那的青年友人與村裏的青年人之間便發生頗劇烈的議論。我承認愛國心是美的，默然的對於雙方都懷着好意地聽着，可是說到支那似乎是很強的國，就是和俄國英國對抗也不會失敗，我也有點出驚了。」

爲什麼要出驚呢？武者小路實篤：我們相信抗戰必勝，倒不是以爲我們「是很強的國」，而是根據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決定了法西斯侵略者之必遭潰滅，被侵略者的全民族聯合抗戰堅持到底之必得勝利。說到「俄國」（那定是指蘇聯吧），它壓根兒不是侵略國，我們用不着跟它「對抗」；美國是我們的友邦，也沒有跟它「對抗」之理。武者小路實篤，請少說

些廢話吧！無聊的夢囈，不能起什麼挑撥作用的。你的朋友周作人告誡過你了：「一說便俗」！

「愛國心是美的」這句話也還得加以詮釋，不能這樣籠統地講。譬如在軍部法西斯橫行的日本，真正具有愛國心的日本人，應該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失敗；用赴湯蹈火的精神來打倒軍部法西斯，把他們的祖國從軍部法西斯的手裏搶救過來。因為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是侵略世界同時也侵害其本國人民的。所以在為民族求解放，為祖國求獨立而與侵略者抗戰的國家，愛國心是美的。反之，在侵略國家進行其侵略戰爭時，一些知識分子不能認識侵略戰爭的罪惡；反站在旁邊替侵略者說話，而自以為也是出於愛國心的驅使。那真是愚妄，醜陋！而況武者小路在那篇文章裏又有這麼兩句話：「村的工作是大家都是友人的辦法，却並不是說對於敵人也應無抵抗的那種主義。（原來武者小路是為（愛？）他自己的圖而把我們當作「敵人」了（周作人除外）！這樣的愛國主義者，這樣的「愛國心」，醜，醜，醜！

## 從生死問題談到人生態度

過去曾寫過兩篇談到生死問題的短文，發表在香港的立報副刊上。前幾天，參加張曙先生追悼會，默聽那沉鬱而悲壯的挽歌，又使我想到生死問題。

我們中國人常常說「儒釋道三教」，而實際上中國人對於生死的觀念，的確也逃不出儒佛道三家的範圍。儒佛道三家各有不同的生死觀：佛家的最高境界是涅槃；但涅槃惟佛菩薩有之，至於凡人，仍不能免於所謂輪迴。道家的生死觀較佛家更為透澈，莊子的見解可為代表，他以為現象界的一切在空間上本屬一體，所以顯現出生死的變化，只是時間作怪，因為死的境界為生者所不知，所以大家愛生惡死，其實生死變化由於自然的運行，生者不得不生，死者不得不死；而且死比生更來得自然些，因為生尚有形體拘束，死便得與宇宙同體。

佛家求涅槃，他們的人生態度是出世的，消極的，儘管他們抱着什麼普渡衆生的宏願。

這種人生態度，於社會，於自己，都沒有裨益。梁武帝三度捨身佛寺，終不能免於臺城之厄。至於想靠行些小善來免於所謂輪迴之苦的，那更卑不足道了。道家求解說，只希望能愉快。態度過這可悲的人生，所以他們的人生態度是任其自然，就是莊子所說的「逍遙遊」。這種態度當然也是消極的。對於世事，他們是給它一個漠不關心。從來那些所謂曠達之士，大都抱着這種人生態度。從「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一直到「國家事，管他娘，麻將何妨打打」，都是一貫的逍遙主義。

最後講到儒家。孔子對於生死問題一向是不談的，他曾說過，「未知生，焉知死。」但在列子天瑞篇裏可以找到一段很有意味的故事：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塋，望如也，望如也，望如也，望如也，望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休）焉。」

這故事又見於荀子大略篇，可以說是儒家對於生死問題的解答。把死看作休息，當然生存著的時候就不應該休息了。「生無所息」，這是何等積極的人生態度！孔子一生栖栖皇皇

不眠不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就是從這個生死觀上反映出來的人生態度。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正是儒家的態度（可笑淺薄的王國演義的作者，竟把諸葛亮寫成了道士）。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是非常正確的，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尤其在這抗戰時期，大家都應該明白「生無所息」的意義，活著一天，便該不息地爲抗戰而努力工作。萬一不幸爲抗戰而犧牲了，也等於找到了一個長期休息的機會——休息有什麼可怕呢？

## 雜談三則

### 一 檢陶

陶淵明一向被稱為「隱士」或「高士」，而現在編文學史的往往稱他為「田園詩人」。因為他做詩文恬淡和平，無怨無尤；他雖然做過參軍，做過縣令，但終於「拂衣歸田里」，過着羅士的生活，「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其實自古以來，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是沒有的。我們讀過陶淵明的「述酒」詩，就可知道他並非於政治全不關心，更讀他的「貽羊長史」詩，看他目睹國軍收復北方失地時何等高興。魯迅說，「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罷？」過去「用別一種看法」來檢討陶淵明的，據我所知有三個人。一是朱壽暉。他說，「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

得來不覺耳。露出本相者詠荊刺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又說，「隱者都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一是釅定意。他有「詠荊刺」三首，其詩曰，「陶潛詩喜說荊刺，落日停雲可奈何！吟到恩仇心事湧，人間俠骨恐無多。」「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一分梁父二分騷。」「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堪笑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是章太炎。他說，「靖節自知飢寒相撓，然不肯變故轍以求免。靖節，沮溺之倫也。於慧遠之事佛，周續之之說禮，猶有所不滿焉。」這三個人對於陶淵明的看法，我以爲章太炎看的最不錯。淵明生當晉末，清談已盛極而衰，士大夫已不復以放浪形骸相標榜，同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社會思想漸趨平靜，詩文作風，也由慷慨而漸趨平淡。所以他雖和魏晉間人一樣的喜歡喝酒，但他不放浪，不消極，另具一種高尚的人格與和平的性情，在他的文學作品裏充分表現出來。他爲不肯向狐假虎威的鄉里小兒折腰，寧把彭澤縣令丟掉；爲看不慣欺人孤兒寡婦的那種篡奪的把戲，終身不寫劉宋的年號；爲瞧不起由前朝舊臣一變而爲新朝貴官的江州刺史檀道濟，不但受不了他的餽贈，還揮着手喊他「去！去！」：這是何等的氣骨！「靖節先生」的諡號，不是輕易能够得到

的！他又始終保持着「儒者」的身分；他雖和慧遠等經書往還，但終沒有加入白蓮社。儒家處世，原有三種態度，就是所謂「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淵明正是一個「有所不爲」的狷者。龔定盦說他「酷似臥龍豪」，又比之以「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的屈大夫，終嫌擬不與倫。朱晦庵說他「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只道着了一半；他不僅「欲有爲而不能」，同時還「有所不爲」。惟其如此，所以擬之以長沮溺桀，最爲確當。他自己也說的，「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饒陶淵明那樣的詩人，我們生在千載之下而又值社會遽急變動的今日，要學像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覺得，如果看到現在某一家家的幾篇小品，因爲他裏面不談國家大事，文章也做得平淡而澹永，便恭維他，說他「復像陶淵明」，那未免厚誣古人了。

## 二 貶賤

從晉末到南北朝，北方固然長爲異族所割據，南方也篡亂相尋，文章作風便由平淡而轉爲哀怨，庾子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子山以南朝使節，被西魏強留，不能夠回江南來；其後歷事周明帝和武帝，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可以說是備受榮寵了。然而他不忘故國，懷鄉思歸之情，一一寄之於詩賦。到現在，讀他「哀江南」「小園」等賦的，無不悲其志而哀其遇。杜工部說他「暮年哀感動江關」，可見從前人也大都受子山詩賦的感動，對於他的屈身仕北朝，往往加以原諒的。

本來中國在東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因長受異族的侵陵，士大夫的民族意識非常淡薄；加以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落後，雖以武力佔領了西北，政治上的設施一切都要仰仗漢人，對於所謂精神望族，未敢輕視，士大夫也就不顧到什麼「名節」，樂於爲之使用。所以庾子山奉使西魏，與蘇子卿的奉使匈奴，未可相提並論，假使蘇子卿與庾子山易地而處，怕也未必能耐苦十年，節毛盡落的吧？

但是，就民族主義的立場講，像庾子山一流人的立身處世，究竟不可爲訓的。士大夫最寶貴的是氣節。陶潛明自晉入宋，倘且「恥復屈身異代，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訖，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和以來，但書甲子而已。庾子山以堂堂南朝使節，一旦被

威武所屈，富貴所淫，「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坡」，無論他的詩賦寫得怎樣哀感動人，總以春秋大義，終不免要受「一字之貶」吧！

### 三 呵周

在我國現代文藝作家中，周作人也不失為第一流人物吧？他的散文寫得何等平淡而雋永！沒有廣博的學識與深湛的修養（指文藝的修養），是不能夠達到這種境界的。因為他的文章作風的平淡，所以早有人以「苦雨齋主」比「五柳先生」。他自己也沾沾自喜，以為真正的文學應該是「言志」，其他無論唐宋八大家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不免落入「載道」的窠臼。所以他談政治，不講理論；他的文章題材，大半是「喫茶」「北京的茶食」之類。到後來他又大捧其明末的「公安」「竟陵」派，頗有人隨聲附和，所謂「明人小品」，居然風行一時。然而從此以後，他自己的作品漸趨庸俗；而以專講「趣味」的結果，思想行動都走到了個人主義的極端。

董清橋的砲聲，驚醒了「一切醉生夢死的中國人」，然而我們的「苦雨齋主」，卻仍舊從容

不迫地在他的「寒齋」裏喫「苦茶」！鄰居的無線電收音機，可以使他爲了俗曲俚歌的刺耳而失眠，「皇軍」的飛機大砲聲，却可以使他安閒地聆賞。平津淪陷了，他還不肯離開他的第二故鄉北平，又不肯跑出他的「苦雨齋」，去幹點應該幹的工作。於是關心他的，愛護他的朋友們都替他担心，怕他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而果然，不久他就從「苦雨齋」跑到「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去了。然而還有人替他辯解，以爲這是他出於不得已而與敵人虛與委蛇；他在敵人監視之下無法離開北平，他的身世正和庾子山一樣可憐，不久會有哀婉的文章寫出來向國人申訴。這些替他辯解的人也真是苦心孤詣。從陶淵明一變而爲庾子山，總算我們的周作人先生還沒有丟臉嗎？要知道庾子山的時代和現在不同：當時據割北方的異民族文化比我們落後，他們沒有亡我國滅我種的野心與能力；而現在的日本是一個嶄新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他們不但要亡我國，還要滅我種哩。庾子山以漢人仕北朝，不過是失節；周作人以「中國人」的資格而出席日本法西斯狗所主持的什麼「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那決非僅僅是失節，而是甘心做「漢奸」了。處於現在的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做一個保衛民族的鬥士和出賣民族的漢奸，還有夾縫可鑽，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嗎？而況自從敵人把周作人參加的

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的記錄公開發表以來，我們並沒有見到過周作人申辯的文章，反之，在「宇宙風」等刊物裏，倒還刊載着他的「貫作風的悠閒的新作品。人之無志，一至於此！他標榜「言志」文學，我不知道他現在所「言」的是什麼「志」？

前傳周作人於元旦下午二時在北平寓所被狙擊斃命，最近救亡日報發表了周老太太給周建人先生的信，才知道周作人的「被狙擊」是事實，「斃命」却是謠傳。而且周老太太告訴我們，周作人還是「兢兢自守」。這消息我們聽了高興。我希望他受了這次懲創，翻然悔悟，洗心革面，從此立志「作人」，參加抗戰工作，這樣，過去種種還可以說是「白圭之玷」而非「晚節不終」。僅僅「兢兢自守」是不够的。不過我的希望大概是徒然的吧？僅有受過手槍的懲戒，子彈尚未取出，而又悄然遁去，繼續做他的漢奸勾當的。你瞧！

## 談讀書

### 一 從焚書到讀書

近來讀書之風大盛。馬一浮先生主持的復性書院雖未正式開講，而各機關已紛紛成立讀書會，砲火連天而絃歌不絕，這是何等偉大的氣象呵！

焚書契之興也尙矣。三墳五典，我們生也晚，沒福氣讀到它，然而亂臣賊子所害怕的春秋，我們是讀過了的。講到害怕書，不僅亂臣賊子，古代專制帝王也是如此。最害怕書的是秦始皇；他竟不擇手段，收民間藏書，付之一炬。然而推翻他的政權的，却是不讀書的劉項。「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乃翁以馬上得天下，安用書爲」，這真是書的倒楣時代。然而「以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還得請教叔孫博士定朝儀。而歷史上幾個所謂雄主，究竟都是聰明的，他們知道讓羣民胡亂讀書總不大妥當，秦始皇的政策是失敗了，所以燒書也不

是辦法，與其矯，毋寧諛，但須有一定的範圍，不得自由亂讀，庶於讀書之中寓統一思想之意；此漢武帝之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書被尊爲「經」，其他則概稱之爲「諸子百家」。研鑽儒家的經，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可以榮宗耀祖，可以顯親揚名。讀諸子百家的書，便被諛爲「異端」，現在新名詞則叫做「反動」云。

聰明的唐太宗，更替讀書人開闢了一個做官的捷徑，便是科舉制度。從此以後，只要不是「攻乎異端」（議案：攻，研究也），寫詩也好，帖經也好，都有飛黃騰達的分兒。士子們埋頭讀書，皇帝則點頭微笑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只是詩可以言志，雖然「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類並沒有什麼大志可言，但總是自由發抒情感，似乎也不見得十分妥當。因此，後來的皇帝的謀臣更替皇帝想出一個更妙的方法，索性把文章也劃定範圍，規定格式：這便是宋朝的經義和明清時代的八股。不論經義或八股，都是要代聖人立言，不准講自己的話。從此以後，士子們讀聖賢書，說聖賢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封建制度爲萬年有

道之長，「天不變道亦不變」。懿歟休哉，皇帝萬歲，民無能名焉。

總而言之，秦始皇的燒書和後來許多皇帝的勸人讀書，方法雖不同，精神卻是一貫的，無非企圖借此以齊一思想，防止反動而已。所以李丞相板起臉孔說，「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而宋真宗則甘言蜜語道：「士子們，不要亂攪，好好兒去讀書罷，」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我說了許多話，並不是反對讀書，也不是疑心現在勸人家讀書的都別有用意，我不過指出從前那種欽定的讀書辦法是要不得的，最好的方法，是讓人家自由研究，自由批判，因為無論學術或文藝，只有在容許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環境之下纔能進步發展。

## 二 好讀書，不求甚解

書之應該讀，是有沒問題的；讀書應該不受什麼限制，自由研究，自由批判，在此時此地，我想也沒有什麼問題的；剩下來的是書之如何讀法的問題。

從來深通讀書三昧的要推陶淵明。他在五柳先生傳裏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

意，便欣然忘食。」這「不求甚解」四字却被許多人引爲口實，以爲陶先生讀書馬虎虎虎，像項羽先生學兵法似的，只略知其意，不肯求進一步的瞭解。其實爲此說者，全沒懂得陶淵明所說這一句話的用意，更不認識陶淵明的時代。原來自漢武罷黜百家以來，那些庸俗的經師們，祇懂得什麼師法家法，非但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就是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流弊所及，不失之拘謹，即失之繁瑣，如秦近君解釋堯典「曰若稽古」四字數萬言，眞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到了魏晉，王肅王弼排擊漢儒，自標新學，這在中國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說是一個革命，但流弊所及，士大夫束書不觀，專尚空談。陶氏生當晉末，清談之風已盛極而衰，讀書空氣却還不很濃厚，他會慨歎地說，「如何百世下，六籍無一親？」所以他的「好讀書」的態度，對於當時束書不觀的社會風尚，實給予一有力的矯正。「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更矯正了漢以來學者，斤斤於詁訓章句而忽略大道宏旨的流弊。他惟其懂得讀書的方法，纔能領略讀書的趣味，「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境界，不是專事尋章摘句的笨伯們所能够體味到的。

自廢科舉改學堂以來，讀書方法總算漸有改進，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然而如胡適博士

之流的考證功夫，却免不了「其弊也瑣」的批評。即以胡博士而論，一字書詞，動輒數千言，一事考證，長至數十萬言，而乍見「帝國主義」的名辭，便驚詫以為海外奇談，這種明察秋毫而不見興義的笑話，完全因讀書求甚解鬧出來的。尤其對於文藝作品的欣賞，如果從一字一句上去求甚解，怎樣能領略全篇的好處？

讀書，讀書，我們要求有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讀書環境。

讀書，讀書，我們要在容許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讀書環境中養成「好讀書」的風氣，而以「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來達到「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一九三八，四。

## 懷新文化運動三戰士

——劉半農，魯迅，錢玄同

「新青年」是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代表刊物。提起「新青年」，一定聯想到陳獨秀胡適之，然而我今天對於這兩位先生不願有所論列，我非常贊同「蓋棺論定」的辦法，雖也有感慨歎「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然而後人對於蔡中郎究竟是有了定評的。

劉半農，魯迅，錢玄同都是「新青年」的經常撰稿者，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士，現在都已經蓋了棺了。在紀念五四運動的今天，特別引起我對於這三位戰士的緬懷和嚮往。

劉半農先生是以「洋場才子」參加到文學革命陣線裏去的，魯迅先生說他到北京「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給我們罵掉了」。然而我們要知道，在那時候，從黑幕派的圈子裏跳出來，變成一個文學革命的戰士，非有大智大勇是不可能的。半農先生在「新青年」裏寫的文章很多，單是那篇「

答王敬軒書」，把滿腦子封建思想的舊文人罵得體無完膚，多麼活潑，多麼勇敢，而又多麼可愛啊！後來他留學法國，研究語言學，儼然一位學者了。只可惜他不能把洋場才子的沈淙殘渣澈底清除，重又玩起爛古文，打油詩來，淹沒了自己過去的光榮戰績；然而他在距病死前不久發表的那篇「阿彌陀佛」，是可愛的，他還沒有完全消失他的戰鬥精神。無論如何，半農先生總不失為一個新時代的戰士，較之勤青年們讀莊子文選的「洋場惡少」而又滲入一點「上海流氓」的氣味的文僮們，真有虎狗之別了。

魯迅先生在「新青年」裏發表的「狂人日記」，我當時受到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感動，從此我就用另一種眼光來讀中國歷史，他所給予我的影響太大了，現在我沒有這樣筆力把我的感想一一達到紙上，「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再用不着我在這裏歡喜贊歎。可笑有些後生小子，看先生已長眠地下，不能再舉起他的「投槍」，便在小報上作文奚落先生在。這真是螳螂撼樹，太不自量了。我可以告訴他們：魯迅先生不是「拔劍逐蠅」的傻子，即使他還活着，他的「投槍」也不會向螳螂們舉起的。

錢同玄先生是「新青年」裏的一員「國將」。「選舉妖孽」「桐城蠅種」的口號是他提出

來的。他像獅子搏兔般用全力來攻擊文言文，用全力來打擊黑幕派，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可是他後來漸漸把鋒芒斂藏，正如魯迅先生批評章太炎所說的「雖先前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却退居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營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今年一月，他的死耗傳到上海，有人在「譯報」上做文章紀念他，說他「壯年以鬥士領導青年，中年以學者努力學術，晚年以義士保持名節，總算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國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話似乎是說得對的；但我以為學者和鬥士不一定要分別界限，劃清年代。錢先生做鬥士的時候，何嘗不是一位學者？學者而兼鬥士，不更好嗎？保持名節，更是分內事，用不着特別表章（如因為現在在北平天津的文人學者頗有甘心認賊作父的，對於錢先生之不受敵人威脅利誘，就覺得應該特別表章，甚而加之以「義士」的頭銜，那麼，反過來講，受敵人威脅利誘的，倒是極平常的事了）。我們紀念錢先生，應該特別指出他在五四時代的英勇戰績，這時候的錢先生，纔不愧為後生楷模！

五四運動已成陳迹，然而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戰士的豐績，是值得我們懷念的。我懷念劉半農，錢玄同，我尤懷念魯迅！——他以一個民族的戰士走上文學界，始終沒有放下過

他的「投槍」，一直到他臨死前的幾小時。記得前年在海寧，我曾恭聆過一位「特派員的」的「訓話」，他說，「你們在這兒不好好做宣傳工作，却有閒工夫去來紀念魯迅，而且貼着什麼繼續魯迅先生的奮鬥精神的標語。這成什麼話？魯迅穿過軍裝，上過前線沒有？什麼叫奮鬥的精神！」時光真快，匆匆已近兩年了，久不得這位特派員的消息，想來必已穿軍裝，上前線去了，然而不受訓誨的我，到今天還是要向青年提出這樣一個口號：「繼續魯迅先生的奮鬥精神」！

一九三九，五〇。

## 「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辨妄

我生長在浙江海寧，從小就聽到一種傳說，據說清朝的乾隆皇帝原是「陳閣老」的兒子，是悄悄地掉了包的，後來乾隆皇帝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南巡時，特地到海寧去拜謁祖廟云。當時有些人聽了確乎很高興，以爲我們雖被異族所統治，然而做皇帝的却是我族陳家的子孫，因此就死心塌地——不，高高興興地做與愛新覺羅氏的「子民」了。這，確乎此阿Q高明得多，欺侮阿Q的阿Q的兒子們，誰會做過皇帝來？

滿清被推翻了，接着又有一個異族想來征服我們，那便是日本，古稱倭寇。但有人說，日本也是我們漢族的子孫。據說，秦始皇派徐福帶領了五千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徐福飄海到了現在的日本地方，就留下來，不再回中國，這五千童男女，生長蕃殖，就變成七千萬日本人。因此，有人主張我們現在不要說「抗敵」，應該說「討逆」（謹案：逆者，忤逆也）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無異兒子打老子云。

這倒是道地的「阿Q哲學」。所可怕的，現在日本的侵略者也承認日本是一家，所以他們要回老家來，替老家建立「新秩序」。萬一日本真在中國建立起什麼「新秩序」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老子們」，是否甘心讓兒子當家，死心塌地的爲兒孫作馬牛呢？

我們不再追問下去罷，愈問下去愈覺得無聊的。讓我們來查一查，日本是不是徐福的子孫呢？謹案：徐福帶領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最先見於史記秦始皇本記。其辭曰：「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正義引括地志云：「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僊人，正往此洲，共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所謂徐福入海求神仙的史料，僅有這一點點，不充分得很。我們要知道，從戰國到秦漢，所謂「扼腕言神仙」者，大抵都是燕齊人，原因是山東一帶近海的人，嘗目覩海市蜃樓，誤爲仙山之故。徐福人山東人，他也許真相信海中有什麼三神山，所以自告奮勇，入海訪求。但神仙一定求不到的，他又不肯回來，只好揀一個小島登陸（就姑且認爲叫做「

「宣洲」的疆，以後就沒有下文了。至於記述所謂「倭人」（即現在的日本）的，最先見於漢書地理志。其言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顧注引魚豢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夫班固著漢書時，去秦始皇求神仙不過二百年，徐福帶領去的「數千童男女」，即使努力生產（案：生產作生育解），依照馬爾塞斯的人口增加說來計算，也不會蕃殖到「分爲百餘國」的，而況「樂浪海中」或「帶方東南大海中」，都不是括地志所說的「東海」。

所以說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實在比說乾隆皇帝是陳閩老的兒子還要可笑。中國人似乎喜歡攀親，而實際上我們從前確也跟匈奴，突厥，烏孫之類「和親」（通稱和番）過。不過攀親倒還是小事，認敵人爲兒子，這可不是玩的！

在這抗戰的嚴重關頭，我想大家應該嚴肅一點才好。講荒唐的故事，最好在「豆棚瓜架」之下，如果寫成文章，作爲宣傳資料，那便不免爲識者所笑而爲敵人所高興的。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 從「怪異文字」說開去

什麼叫作「文字」？據許叔重先生說，「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古人最初寫字就是畫畫，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半圓形是「月」，即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但有許多無形可象的，怎麼辦呢？便想出一個所謂「會意」的方法，例如畫兩顆樹是樹林的「林」字，畫一把刀在牛角之間是解判的「解」字。然而還有許多物事，是無論如何畫不出來的，便又想出一個「以形定義，以聲諧音」的辦法來，就叫做「諧聲」。例如先畫一個「口」，表示「問」字的意義，再畫一對「門」，表出問字的聲音。後來又有什麼「假借」「轉注」之類，於是字便「孳乳而寢多」了。隨着字的孳乳寢多，畫法也漸漸簡單起來，到了秦朝的「小篆」，已經「或頗省改」，遠離了寫實了。由小篆到隸書，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雖形象是十萬八千里，同時

因爲「寫」起來（不是畫起來）比較便當，應用漸漸廣泛，新增的字就更加多起來了。揚子雲作「訓纂篇」時，只有五千三百四十字，已經「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但到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已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去重文一千一百四十三，都凡八千二百一十字，較訓纂篇加多四分之一強；再查現在通行的字典，那比「說文」又要多幾倍了。如果能起揚子雲於九泉之下，叫他讀許叔重的「說文」，他一定要駭詫有這麼多的不認識的「怪異文字」；能起許叔重於九泉之下，叫他翻讀現在通行的字典，他一定拍案大叫：「怪異！怪異！有這麼多的怪異文字！」尤其是王雲五先生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把許叔重所定的「部首」根本推翻（但可惜四角號碼一方面又保全了漢字的形式），真是大逆不道。我想許君復生，怕不止提出禁止簡體及怪異文字案，還要呈請通緝四角號碼檢字的發明人哩。

有人說，「許君通達，決不會幹這樣可笑的事，因爲他懂得『字者孳乳而寢多也』的道理，所以他編『說文』就把通行的俗字都編進去，而把不通行的古字列爲重文。」其實懂得一點社會進化的道理的人，決不會天真到打算阻止文字的「孳乳而寢多」的。魯迅先生說得好：「維持現狀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什麼時候都沒有效，因爲在實

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現狀，一切都和本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摹乳而成「字」，筆決不能臨而爲隸，隸決不簡單化爲現在所謂「眞書」（案即楷書）。

至於怎樣的字才算「怪異」，也很難說。我想除了爲大眾所不能認識的字，如道士們所造的大禹「峽嶺碑」的文字，以及爲古代所認識而現在已不通行，如什麼「大篆」「小篆」「籀符」「古文」之類以外，凡是現在所通常習用的，以及新創的簡體字而爲大眾所認識的，就不能說是「怪異文字」。叫古人來讀現在新創的字固然要覺得「怪異」，但我們看了古人習用而到現在早已死去了的字，又何常不覺得「怪異」。許叔重的信徒章太炎先生，做文章歡喜寫「說文」裏所有的所謂「本字」，往往避去通常習見之字而用「古」字，但只能用木板來印他的「章氏叢書」，發長篇大論的通電時，也就只好從「俗」了，因爲他所寫的「本字」不但一般人不能識，電報號碼裏就沒有這些字。從章太炎的眼光中看現在通行的俗字，也許覺得「怪異」，但大眾看見章太炎所寫的「本字」，尤其覺得「怪異」，而且事實上只有章太炎所寫的「怪異」的文字才真正的在通行。

繁複的難寫的字，天天在淘汰，簡單的易寫的字，天天在創造，「振古如斯」，並非「歷久彌新」，要阻止是阻止不住的。同時一個個體字或一個新創的字，「定要經大衆公認」才能成立，才能流行，例如「蒼龍」以後所新創的「她」「牠」等字，現在已經通行，大家還不覺得「怪異」，而沈玄微劉大白所造的代表他們的「佢」字，現在就沒有人引用了，唐朝的則天皇帝武曌女士，曾造過幾十個字，下詔全國採用，然而等不到她龍馭上賓，這幾十個字早已死掉，歸入「怪異文字」類中去了。總結一句話，被大衆所公認的所習用的文字，無論少數人怎樣百厭憤張地大喊「怪異」，呈請禁止，也是無效的；反之，爲大衆所不需要的字，恐少數人去創造，無論怎樣合乎所謂「六書」的規則，甚至於通令採用，也是徒然的，則美皇帝就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有人在憤慨了。他們說，「我們要維護中國文字的獨特與尊嚴」，所以不能讓那些「怪異文字」流行。說起「中國文字的獨特與尊嚴」，那個是確實的。造成這種獨特與尊嚴的原因，是中國字的難識和難寫。在漢朝初年，規定「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誦經書九千字，乃得爲吏」，這已是不容易的事。在漢宣帝時，能認識「含詠篇」中的字的，只有張敞，杜業，爰

禮和秦近君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所以中國一向讀書識字只限於極少數的貴族官僚們，不僅「禮不下庶人」，字也「不下庶人」的。這樣，「中國文字」不僅「獨特」而且難認難寫，使一般民衆只知「敬惜字紙」，從不敢作非分之想，想去跟它熟識。庶人沒有識字的資格，文字就「尊嚴」了起來；同時少數特權階級的人，因為識字而更增高他們的身分；這樣互爲因果，於是識字的人就竭力要使文字加難。到現在，雖然什麼「平民教育」等等喊得很響，然而一些腦子裏還充滿着封建思想老爺們少爺們，還想來把持文字，維繫他們的搖搖欲墮的「獨特」的地位。他們反對文字簡易化，怕認識字的人多起來，會使他們的「獨特」與「尊嚴」的地位降低。我替他們設想，爲「維護中國文字的獨特與尊嚴」計，最好回到從前「畫畫兒」的時代，把一切非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都歸入「怪異文字」一類，從新畫起來，兩顆樹就是「林」字，一顆草，五個爪，一枝樹就算是「菜」字，鑄成銅模，排印成書報，倒也別緻，而且更顯得「獨特」；做文章就是畫畫，又合乎「爲藝術而藝術」的原則，豈不美歟？

這是笑話，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不過我想，既然「大喊」維護中國文字的獨特與尊嚴，

那麼自己至少要對於中國字多認識幾個才好，因為這樣才能顯示出「尊嚴」來。但這似乎也不大容易，要像章太炎那樣寫「本字」固然做不到，就是幾個最平常的形近易譌的字，他們似乎也不大能够弄清楚。一面鼓的「鼓」和敲鼓的「鼓」字，退卻的「卻」和開卻的「卻」字，段落的「段」和假借的「段」字，他們都能辨清楚嗎？我們只要一翻近時出版的書報，就可以看出這些形近而義異的字，早已在混用了，但這也沒有法子，不必特加「指正」，我想懂得一點文字變遷歷史的人，如果動手編字典，就應該在這些字下面注明現在已經通用。

文字的改革跟社會進化而俱來，正如長江大河的流行，一瀉千里，誰也阻擋不住，堂吉訶德穿了古代的盔甲，到各處去「除邪懲惡」，但他的長槍終於被風車捲斷了——這風車就是「時代的巨輪」。

## 元祐黨人碑

桂林多岩洞，但古蹟似乎特別少，這也是桂林人的模質處，不像我們江浙，只要有一個小小的土山，就會造出許多古蹟來。然而龍隱寺裏的「元祐黨人碑」，至今依然無恙，外來游客，到了這裏，總不免要留連一番。

我初到桂林時，曾在市肆中千方尋求這碑的拓本，後來給我找到了，可是爲了索價太貴，沒有買成。去年夏間，搬到龍隱岩附近去住，龍隱寺裏的晨鐘暮鼓，又使我想起這塊「黨人碑」來，結果居然在寺裏買到兩張拓本，價錢並不貴，每張桂幣五圓（合國幣二元五）。那碑是鑄在石壁上的。闊約四英尺，長約六英尺。字爲蔡京手書。據說，當時在京師立碑，再將拓本頒發各地立石摩刻，因此我們還能够在今天來賞鑒蔡京的書法。蔡京的字確乎寫得不壞，雖然偏於娟秀，缺乏遒勁氣，但如果拿汪精衛的字來相比，似乎蔡京的到比較還有

點兒骨氣。

碑上鐫的姓名，自司馬光以下凡三百九人。但我仔細數來，却只三百八人。按：全碑共四十二行，惟自第四十一行以下模糊不可辨。第四十二行祇隱約見「惇」字。而第四十一行下有「章惇」的姓名，惇字作「惇」，字體拙劣，顯係後人加鐫上去的。因為碑上明明分着「文臣」「武臣」「內臣」三大類，每一類中又分有小類的，姓名皆另行起，故第四十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的底下不應鐫姓名，而第四十二行應有兩個姓名，第二名卽爲章惇，現在「章」字已模糊，只見一「惇」字，而好事者便在第四十一行底下補上「章惇」兩字。這樣，便可知道原有三百九人，並無錯誤，不過有一個人的姓名已模糊不可辨認了。碑的左邊尚有後人加鐫的跋，字跡不易辨認，以無關重要，現在略去不談。

去年秋間。沈衡山先生來桂林，他老先生結習未忘，說要帶一點別地所沒有的紀念品回去，我就把「元祐黨人碑」的拓本送給他。把這拓本送給他老先生，我覺得是最適合的。他看了低徊沈吟，撫然若有所感。曾在一個宴會中，大家談起這塊碑，其時我酒酣耳熱，發了一段近乎憤慨的議論。我說，

「平心而論，司馬光固不失爲君子，王安石也何嘗是小人，不過一個是代表大地主，主張保守，一個是代表自由商人，急於想實現他的改良主義，政見不同而已，人格上並沒有高潔與卑污之別。蔡京之流纔是真小人。標榜新政，大算舊帳，於是元祐朝臣，盡列黨籍。然而結果如何呢？據說，黨人的子孫，以其祖先名列黨籍爲榮，舊碑毀了，又重新舉鎮起來。而史臣則指斥蔡京道：「廣布私黨，嫉視人民，遂存靖康之禍」。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漢奸們的惟一長技，就是算舊帳，挑是非，攪亂位，排異己，受其害者即是國家民族。靖康以後，中國人民婉轉於異族淫威之下者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我們在今天撫摩這塊古碑，真有無限感慨。」

不過我發這議論時，衡山先生已回重慶去了，不知道他老先生的感想何如。

二十九年一月。

## 觀桂戲「桃花扇」有感

最近我看了一次桂戲，演的是歐陽予倩先生改編的「桃花扇」。這一部有名傳傳奇，我一向是愛讀的，現在看它在舞台上搬演，這是何等高興的事！予倩先生的改編是成功的。他並沒有像一般舊戲把所謂「奸臣」形容得萬分不堪，而把所謂「忠臣義士」，做得一無缺點。阮大鹹，侯方域都保存了他們的個性。兩面派的楊文驄，也表演得恰如其分，他也知道「這樣看來，圓海（阮大鹹的號）真小人也」，然而他始終依違於侯阮之間，這就是魯迅所說的「二丑藝術」，可以替現在自命爲「第三種人」者寫照。最後一幕，借李香君入山修道，來反映國破家亡的情景，是異常淒涼的，現在有些只盼望「和平」早日到來，想回去過安樂日子的人們，看了這一幕，大概可以有所省悟了罷。柳敬亭的一曲「哀江南」，詞譜俱佳，雖然不是孔尚任的原文。

「桃花扇」是寫明末一部分士大夫與奸黨鬥爭的情形，而以所謂「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爲主角。方域嘗自立「雪死社」（創立於崇禎十三年），然而他和「復社」有關係。復社創立人張溥所訂定的復社盟誓是這樣的：「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務已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殛。既布天下，皆誓而守」。侯方域有沒有遵守這個誓詞呢？是沒有遵守的。他不能嚴肅自己的私生活；他又犯了務已之長，形彼之短的毛病。本來明末的「東林」「復社」，好以意氣用事，流弊所及，使一般動輒分子都感到日暮途窮，不惜倒行逆施。一紙「南都防亂揭」，雖足以塞奸人之膽，然而同時卻逼迫着阮大鍼之流挺而走險。我們現在所謂「爭取兩面派」的口號，明末的士君子是不懂得的。尤其是侯方域，他的好名勝過了一切，所以作事只憑一時意氣，全沒有「弘毅」的美德。他爲急於刊布自己的文集（壯悔堂集），感到分量少，就一夜補寫了好多篇，據後人考證，他的「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和給阮大鍼的信，都是後來補寫的（詳可看「曲海總目提要」）。他勸吳梅村保持名節，而自己後來却去應順天鄉試！吳梅村雖晚節不終，做了清朝的國子祭酒，然而他遺命在墓碑上但題「詩人吳梅村之墓」，尙以故國遺民自居。假使

侯方域不病死，他後來的結局，怕是不堪設想的罷？所以黃梨洲對於侯方域頗多微辭，例如說他早年縱情聲色等等。就「復社」的盟詞來說，侯方域對於「毋干進辱身」的一條是違反了的。大德既虧，其餘便無足觀了。但因為「桃花扇」傳奇的流行，「侯公子」之名居然煊赫到現在，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幸運！這次予情先生改編的「桃花扇」，沒有把侯公子裝點成一位毫無缺陷的正人君子，我覺得這是予情先生的卓識處。

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點認識，就是我們要跟惡勢力奮鬥，先得嚴肅自己的私生活；我們固然不能寬恕敵人，但對於一些動搖猶豫，尚不敢公然為惡的分子，我們要設法去爭取，否則，「疾之已甚，亂也」。一

九四〇年一月

按楊文驄一時侯達阮之間，遂被取作「兩面派」的代表人物，然楊子金陵陷時死難，蓋棺論定，侯朝宗之應順天鄉試，不免魂對死友矣。故田漢先生「桃花扇」詩云，「莫將褒貶等閒看，人物千秋幾個完？君子小人爭一著，文驄未作蒲洲官」。

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錄。

## 想到寫出

### 一 詩趣

我不會做詩，但也懂得一點所謂「詩趣」。「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不能算是詩句。「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無數片」，這也不成其爲詩句，但加上一句「飛入梅花都不見」，便成一首詠雪詩了。龔定盦「夏進士」詩云，識君則在北，哭君在杭州，時乙酉既臘，西湖寒不流，全仗有末一句，纔成其爲詩——雖然不是一首好詩。因爲「飛入梅花都不見」和「西湖寒不流」，都有「詩趣」也。

### 二 詩與語言

近與聖陶通信討論詩詞，聖陶來信說，「詩詞爲形式所拘，的確不宜寫新詩詞，新意境

。新體詩現在很少有好的，弟也怕看。但理想中的新體詩，是值得追求的。攝取語言中之美，用來寫當前的事物，抒當前的情感，當可有成。現在新詩人似乎對語言就沒有敏感，只能從外國詩從文言文裏去剽竊，並且畫虎不成，自然很少有值得一看的了。」

說到對於語言的敏感，就使我想起晉朝人。「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感」，「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或寫悲感，或抒豪情，都是能夠的「攝取語言中之美」。如果拿來寫成詩句，一定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類並傳千古。但這不過舉例而已；現代有現代的語言，有現代的語言之美，只要我們對語言有敏感，自然會寫出好的新體詩來。否則，即使管人吐屑，復見今日，而時隨淺薄，也就味同嚼蠟了。

### 三 朗誦與低吟

近三年來，有以「朗誦詩」相號召者。夫「朗誦」者對「低吟」而言；既有「朗誦詩」，則必有不能「朗誦」而只能「低吟」的詩。其實無論朗誦也好，「低吟」也好，既然是一

詩」，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念得出，讀得響。三百篇不僅都念得出，讀得響，而且據說都經孔老夫子「絃歌」過的。下迄唐詩，新樂府可以唱，不必說，就是尋常的五七律絕詩，只要寫得好，就會被人傳唱，王昌齡的「黃河遠上白雲間」，就是最好的例子。宋詞元曲，都可以唱，更不必說了。我希望現在寫新詩的，能於音律方面稍加注意，那對於新詩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 四 詩美

魯迅說，「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寫詩，否則鋒銳太露，能將詩美殺掉。」因此，我想起白居易的「長恨歌」。假使白氏跟玄宗一起到四川，眼看著「六軍不發可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一時情感旺盛，決寫不出那樣纏綿悱惻的長恨歌來。惟其事過境遷，纔能低徊慷慨，寫成這樣一首好詩，雖然「蛾眉下少人行」，顯見他不熟悉地理，與當時的史實不符，然而並不減殺其「詩美」。近來頗有人詫怪於在這偉大的時代，不見有偉大的詩篇和小說創作，如果懂了這一點，那自會覺得這詫怪是多餘的。

## 五 詩題

善作詩者，往往能在一個大題材中抓住了某一點，信手寫來，斐然成章，使人家讀了，低徊慷慨，不能自己。記得前年台兒莊大勝，新聞記者前往戰地視察，見有無數士兵，優游自在地在運河邊洗腳，我以為這便是大好詩題，如果寫得好，那麼「濯足運河邊」一定可以和「飲馬長城窟」同垂千古。只有笨伯才會從正面着筆，來一套老調，喊着「英雄的戰士啊！我們的台兒莊啊！」取快一時，等到時移境遷，便了無意味了。

刊 叢 小 作 創

# 突圍記

孫陵

實價四角

八月出版

這本書包括作者最近所寫的突圍記，及戰地小品和其他散文數篇。抗戰開始，作者即參加戰地工作，去年隨軍會戰時，作者正在隨縣前線，搜集寫作材料，後隨大軍轉進，跋涉山谷數千里，隨處遭遇敵人，從事戰鬥，最後終於完成反包圍，獲致大勝。各種經過，作者均一一寫於突圍記中。戰地小品數篇，文體美麗，述敘生動。其他各篇。亦均係極得一讀之作品，日內即可出版。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二五〇〇

創作者小

戒 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 作 人 宋 雲 彬

發 行 人 孫 陵

發 行 所 創 作 出 版 社

四十六號

桂林榕蔭路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三七六號

82

307-14

111



\$ .40